

# 去年的雪到哪里去了？\*

〔法〕金丝燕

**摘要：**1995年9月，汤一介、乐黛云两位先生受法兰西公学的邀请，来法讲学一个月。约我在瑞士人类进步基金会开会，论题是“文化互识：中法跨文化对话计划”，我从此开始了跨文化研究的历史至今。我们的足迹在中国和世界，除了参与，我随笔记写，希望那些参加人类跨文化的伟大志愿者们能给历史留一点生动的细节。21年过去了，这本《蓝天之下》还在继续。下面的文字是其中一章。

**关键词：**中国与法国 跨文化研究 跨文化互识 国际公民社会

我们从来不曾在自己的家园，我们始终在外。恐怖、欲求和期望把我们抛向未来，并剥夺我们对当下的感觉和把握，以使我们沉溺未来，甚至当我们生命不再的时候。

——蒙田

每天早上，和人间的第一个接触是与思想的朋友握手。诵读几页他们留在文字上的思想。维庸和蒙田最常在。尽管已经在另一个世界度过了几个世纪，他们的手仍然温暖。

与法国诗人维庸的握手，是王佐良先生的善缘。1987年早春，我和力川在巴黎大学城德趣馆住。王佐良先生自英国来，谈到他当年在

---

\* 本文属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跨文化理论与方法论”的子课题成果，项目批准号：16JJD750006，项目主持人：金丝燕。此文最初是作者为《陈越光文集》撰写的《序言》，后因故未发，作者做了重新改写。

巴黎买回夏奈尔五号回国送新婚妻子，30年之后才打开的故事，我以杭州敷面招待。先生返回北京，这个故事留下了。6年后，女儿陶陶出生，不想和女儿的生命抢时间，我决定在她的最初一岁间，不写研究文章。可是写作的虫子在心里痒痒的，于是佐良先生夏奈尔五号的故事开始了我的《穿香》。

先生回国，那年圣诞，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一句：“Où sont les neiges d’antan?” 法国诗人维庸（François Villon）的问：“去年的雪到哪里去了？”

这一诗句表述往昔不可追之感。

1995年，乐黛云、汤一介两位先生应法国汉学家施舟人的邀请来讲学。一天，乐先生约我去开会，地点在巴士底狱附近的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会上结识欧洲跨文化学院院长李比雄（Alain Le Pichon）。他正和基金会合作准备1996年的中欧跨文化论坛。我被借调去作为乐先生的代表帮助协调。历时6个月。论坛由欧盟资助，在澳门举行。乐先生特别在电话中嘱咐说有一位北京代表，杭州人，叫陈月光，另一位在杭州，叫黄巧灵，要作为重要参会人士邀请。于是，我准备了邀请信，快件寄出。那时没有电邮，或传真或邮局。次年2月，经过艰苦的努力，论坛按时在澳门召开。开幕那天早上，在早餐厅，众人中有一位年轻人引起我注意：温文尔雅，眉宇间透着沉着和敏锐。我过去问是否为与会人士。他微笑，答曰：

“是，陈越光。”我吃了一惊：“你，是……男？”

“穿越的越，非月光也。你的邀请信称我月光女士！”

道歉是自然的。中午特邀他一起共进午餐。刚坐下，急匆匆进来一位高个子壮大汉。我一抬头？黄巧灵。

“你是金丝燕吧。我差点滞留边境来不了了，你的邀请信写的是黄巧灵女士！”

陈越光听了一乐：“哈哈，原来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啊。还有别的变性啊？”

从此开始随基金会与越光走蓝天之下。我的这一粗心成为日后不时会心的一笑。

同年4月，人类进步基金会与北大乐黛云先生、南大钱林森先生举办“文化间共存与对话”。地点：南苑。越光作为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出席，坐在汤一介先生边上。我们相遇，都乐：这回没有被变性。

会上诞生了两个孩子：中法远近丛书、中法跨文化对话。

1998年4月，基金会“农民农业与世界化”项目与法国国家研究中心共同组织南非考察。越光代表中国参加，我随行，作为中国项目协调人兼翻译。参观农场，见满地杂草，越光忍不住蹲下身子去拔。越拔越多。“怎么这么种地？”越光嘀咕道。我问陪同的南非农业部官员，南非农民好像不专业啊。

“他们是失业的矿工。没有经过农业文明。不知道何为协力团结。南非政府提供给每个失业矿工相当于五万法郎的资助，目的是让他们通过种地学会农业文明的精神。”

接着参观他们的农业改革示范基地：一个养猪村庄。入村，土房子，泥地，小炉灶。村中空地上，严严实实地一排水泥小矮屋。“这是我们的养猪示范基地。”一位接待我们的年轻女村民介绍说。

每一个水泥矮屋干干净净，内有一头猪，个头很小，黑色，说是古代商船偶然从中国带过来的。

“怎么里面只有一头猪？”越光问。

“让它们各自有空间。”女村民答。

我们去森林参观。“我们这里养鹿，平均每公顷一头鹿。”随同的农业部官员介绍。

“是啊，这空间足以养恐龙了。”越光的话很平静，平时发言的风格，尽管思想会极度翻滚。大家都乐了。基金会执委会主席佛郎丝娃（Françoise Astier）至今还会重复越光的恐龙空间语。

1997年7月，越光组织基金会12国20人考察团陕西、山西与江西之行。在闻喜县的田埂上，基金会农民农业与现代化项目负责人吴

翰（Pierre Vuarin）面对摄像机镜头谈当时已经成国际反世界一体化社会运动主题的持续性发展。当时的记者问：“发展就是发展，加上持续性有何意义？”

车行在刚被洪水冲刷的泥路上，赶往乐平县。已经晚上十点。大家很累。只听见吴翰在跟人聊天。他不倒下，嘴是不会停的。黑暗中，巴西的甘地多（Candido）问：“生命是什么？”他是后来巴西世界社会论坛的组织者，是巴西农业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我们1996年在喀麦隆考察时认识。他很地道的法语引起我的注意。巴西是拉美国家中唯一说葡萄牙语而不说西班牙语的国家。他告诉我，他是在巴黎索尔邦大学读的哲学和社会学博士。回巴西后任社会学教授，有感于巴西社会进步问题而无土地农民运动而专注农业与公民运动。1999年APM的中国宁夏考察和北京会议，他都参加了。他谈的主题就是巴西公民运动。

“你说呢？”我问。

甘地多指指窗外：

“生命就是在这条道上奔跑的车。”

这是常识，生命只往前走，不会往后挪。甘地多大概看出我的不屑，说：

“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命，就是两边的景象。被甩在后边的瞬间记忆而已，而且互不关联。”

这有点悲观，像思想家。和越光一样。可是思想是哲学的范畴。怎么搞社会运动呢？他们怎么把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拧在一起而不出毛病呢？遇到矛盾，是哲学家的他让步，还是搞社会运动的他让步呢？这个问题我一直在琢磨，但没有问过他和越光。

1999年7月，越光再次组织20人12国代表考察宁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谢扬同往。当时的自治区主席一听来这么多外国人，没有接受。越光的助手余梅曾是记者，去西藏认识了当时的区领导毛如柏。此时调任宁夏。我们得到了余梅的帮助，作为自治区

党委书记的客人来到宁夏。20 位代表受宠若惊，乐得直摆手。

15 天内，我们驱车走宁夏。从窑洞看到山区移民和历史悠久、规模极其壮观的渠道灌溉水利系统。最后一天，文化考察，看岩画。车到岩画入口，石子路被山洪冲坏了，车陷在水里不能动。我们全体下车，靠人力推，费了很大劲。越光指挥，牛局和全部警卫为主力，我们 20 名外国客人装装奋力一推的样子。不到一刻钟，全体弃车步行上山。那时没有景点，全部原始风貌：蓝天、白云、黄土、岩山。

下午返回银川，突接指示：立即集合，宁夏自治区书记约见。我们快速整装赶往自治区大楼。墨西哥代表维克多发言：“这次我们亲眼看到了宁夏的水利枢纽，真真当代金字塔！中国了不起！我们需要这样有能力的政府！”维克多是感慨拉美各国政府没有魄力。金字塔的比喻，让在场的所有人激动。

2004 年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在古巴举办农民农业与现代化国际会议，世界各地 600 位代表参加。社会主义古巴历史上第一次如此规模的国际会议。越光团长率中国代表团的冯治、郭书田和李成贵参加。我从巴黎随吴翰去。

那是 9 月 2 日周日的早上，瞥见越光远处低头走过。

“背经呢？”我问。

“是诵！”他严肃地纠正道。

早上 8 点，我们五个人按时全体到桌吃早饭。西班牙语翻译安娜（Ana）跑来，通知我们，她已获准让我们中方代表随同渔民代表去远地参观。安娜是阿根廷人，20 世纪 80 年代初移居法国。去的“远地”离哈瓦那 180 公里。是古巴著名的龙虾加工基地。我们必须在五分钟之内赶到大厅与他们会合，一起乘车去。五分钟的早饭，不是难事。我们这几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早饭是不悠闲的，用我 7 岁的女儿陶陶的话，总是“抓着吃”。我们按时来到车前，负责出行的法国姑娘朱丽叶悄悄在我身边说：

要感谢古巴渔业部的官员。他们好一顿问。问你们是不是基金会

邀请的，除了开会，有没有其他诸如搞信息的任务。我下了保证，你们才被获准。

古巴渔业部的官员就在车门前点数。我通过朱丽叶向他表示感谢，告诉他我们就看看，没有研究任务，也不写通讯报告。他微笑点头。我们便上车。车类似我们70年代初的公共汽车，功能不全，没有电视、空调。这正合我的口味：窗户可以打开，让路上的风吹吹。在法国，现代化把窗户都变成密封的了，对外不能接触，更谈不上沿路从车窗递钱买小吃了。没有了过去熟悉的场景，心里总不踏实。这回，重新回到老公共汽车上，能够打开窗户吹风，看窗帘被风吹起又落下，就是没有沿路的小贩也心满意足了。毕竟回到了久违的过去。

车开了1小时，来到一片楼群前。和整个城市的主体风格一样，低楼层建筑。越光说，哈瓦那的情形像中国刚改革开放那段时期，最先发达的是宾馆建筑。这里新建的宾馆二十余层高。摆设比较现代化。服务品质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格调。商店五点下班，十点上班。餐厅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按时开闭，一天三次。吃饭凭票。会议按日子发给每人饭票。外出开会或参观，就没有票。若有代表不外出，那就有饿肚子的危险，餐厅不收钱，而且不提供会议没有安排的饭菜。名为餐厅，空间也巨大，实际运作上只能算是个小食堂，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那种单位小食堂。工作人员有着十足的全民所有制劳动人员的风度。

陪同的官员介绍，我们来的地方是哈瓦那渔业学校，是拉美最大的渔业人员培训基地。主要为古巴和拉美国家培养渔业技术干部，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也为他们培养船员和捕鱼人。我才知道，塞内加尔也是受训国之一，渔业比重大。23个国家和他们有代培合作，其中有意大利，一个非政府组织。

在古巴，渔业占国民生产总值10%，在旅游业、农业之后，处第三位，渔民，或者说渔业工人的劳动收入很高，劳动人民中地位也高。昔日“孤舟蓑笠翁”的独钓已经行不通了。现在的捕鱼，就是用小渔船，没有技术也不行。从中学毕业生中考试录取。有两百名学员。学两年

到三年。“就是我们的中专。”老郭说。我翻译过去，介绍人员说这里是渔业大学。古巴没有大学中专之分，只有学习年限的不同，人人 在知识面前都是平等的。毕业工作之后，还可以再回来培训。

我们参观对虾加工厂。厂里有 32 只船，5 个水上储存库，年产 1600 吨，是拉美最大的加工基地。捕捞 9 个月，每年的 3 月到 5 月是繁殖期。厂里有卫生所，里面有医生护士各一位。工人一年一次体检。医院分级：区、市、省、国家。全部是公费医疗。

上午我们还参观了一个农贸市场。“和我们 80 年代初差不多。”老郭评论道。老郭、小李、冯治都是搞农业的，问题不断。

问：市场定价还是国家定价？

答：国家定价。

问：怎么没有粮食卖？

答：粮食是国家控制生产，国家专卖。

问：土豆也是国家专卖？

答：是的。

问：猪肉是国家专卖吗？

答：不，国家没有猪肉供应，全是私人卖，国家偶尔有鱼、鸡供应。

问：猪肉店工人的工资是多少？

答：基本工资每月 128 比索，再从盈利中提取 5%。有时达到 800 比索。

这个数目已经非常高了，我们了解到古巴国家工人工资，最低是 50 比索每月。排骨猪肉的牌价是每市斤 20 比索，肥肉、肉皮每市斤 14 比索。

由于我们问得友好，考察又认真，在不知不觉中顺利通过政审，被消除间谍的嫌疑，并能继续参观。

下午参观一个劳动模范家庭和一个少年教育特殊学校。

劳动模范叫 Aguilar 先生，是渔业工人。夫人搞教育。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他是村党委书记。房屋面积近一百平方。三房一厅，国家

分配的。可以换房但不能卖房。他是单位的劳动先锋。这里，“先锋”一词很受尊重。我看到，街上公共汽车，黄黄的，50年代的苏联式样，已经很旧，上面也是写着“社会主义先锋”。无一车例外。

他作为劳动先锋，得到国家的奖励。工资提高20%，并奖励小车一辆。

问：什么车呢？代表中有人问。

答：你可以选。如果你要俄国车，那就是新车，分文不用再加。如果你要西方的，那就是西班牙的旧车，要再加钱，但不多。

问：你选哪种呢？

答：西班牙的旧车，值三千美金。

问：有居委会吗？

答：居委会？没有，有房屋管理委员会。

3天之后，2004年9月6日周四晚，越光和1950年代塞内加尔游击队的领袖、监狱里念完大学法律的巴哈（Bara）第二次夜谈。第一次是在南非的好望角附近。谈了几乎一个晚上。巴哈不说法语以外的外语，越光不说中文以外的语言，我做翻译。给越光和巴哈做翻译是一件愉快的事。他俩都会做梦，有纯理想主义的一面。纯理想主义虽然对解决实际问题毫无用处，但却能净化人。

晚饭后，我们到餐厅边上的咖啡馆，冯治和李成贵也在坐。越光开始话题：

陈越光（以下简称“陈”）：我和你在南非做过四个小时的对话。印象很深。你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留存至今少有的堡垒。从21世纪来看，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牺牲者，但又是少数几个始终从现实角度去探讨社会主义运动命运的社会主义者。你对这一运动的前景怎么看？

巴哈（以下简称“巴”）：南非谈话对我影响同样很深。我起初对中国的改革有过担心。但我想，不能用旧时代的思想去看今天的社会，不然就谈不上历史发展的眼光。可是也不能在市场为第一原则的

前提下搞新殖民主义。据我了解，感谢上帝，中国的改革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过还是担心，市场至上会不会被市场牵鼻子，受制于它。

我是在古巴受训、受苏联影响的社会主义者。

陈：20世纪已经结束，社会主义发生很大变化。你现在的实际感觉如何？

巴：我之后思考了很长时间。我怎么想？对中国的变化，起初我是担心的。人是不能阻止历史的。历史的教训就是不能让我们进入新殖民时期。我1963年年底到1965年到古巴，1965年3月25日回到塞内加尔，当时我25岁。回国立即被捕。蹲了八年监狱。直到2000年2月为筹备今年10月的贝宁会议才重回古巴。之前，听到很多有关古巴的传言：专制，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等。我是满怀狐疑来到这里。和这里的农民、工人、渔民、干部和世界论坛的与会者交谈，参观了一些地方，我自问：古巴是不是美国谎言的受害者？了解到古巴面对苏联的变化、美国的压力，他们能坚持，不后退。困难和压力使古巴领导人和古巴人更坚定，相信自己。这不是历史的必然吗？人们是坚定的，相信自己未来的。当然，这里的民主是有节制的，农民不是自由的。但我认为这是必然的。我不相信有泛意义上的自由，只有根据实际情况产生的自由。我相信明天更自由，一点一点地自由，这就是我们对历史的贡献。在我年轻的时候，始终怀着希望，希望人会更自由，生活会更好。也许怀有希望，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力量。我们干吗没命地往前跑呢？我不是保守主义者，但有必要这么往前奔吗？社会主义的价值，对于我，是自由、公正、正义。它适合任何类型的社会主义，无论中国、古巴。这三个价值与市场法则不合。到了下一个世纪，人对自由、公正和正义的追求不会变，这三大价值不变。再过几个世纪也不会变。

陈：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进入市场经济怎么看？

巴：就是这让我害怕。

陈：1949年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是消灭市场经济。当

时我们认为市场有两点不可取：市场经济妨碍公正，造成两极分化；生产的不计划性有着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实行计划经济。一个细节，直到1980年代初，北京牛奶上涨一分钱，都要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们在农村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就是拔自留地里种的葱，禁止自家鸡生的蛋上市场去卖。当时的情形与今天在古巴看到的一样。我虽然没有巴哈传奇的经历，但12—13岁时，就自认为是革命者。我们今天作为改革的实践者，为中国的成功感到骄傲。中国的人口压力、自然环境比古巴要恶劣得多，而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比古巴人的生活好得多。这不是个人智慧，而是社会变迁的力量。

在南非，巴哈说：“中国在21世纪有能力成为世界首脑。我只是在问，你们若是把传统，社会主义的传统，丢掉了，两手空空，怎么去当首脑？”这句话，我当时和现在都无法回答。古巴现在60%的人喜欢用美元做交易。不久的将来，他们的一只脚也会踏入市场经济。我有时也自问：市场就是唯一的前途吗？

巴：社会主义没有统一的模式，统一的途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市场经济是一个虎口。怎么搞也不能落入这一虎口。中国、古巴、苏联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搞社会主义，现在也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市场经济。这就让我担心。

陈：巴哈讲的自由、正义、公正，应该还有富裕，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20世纪苏联没有做到。中国最后还是通过改革达到了富裕。不进入市场，社会主义的理想就只能是理想主义者个人情操与操守修养的内心梦想。

巴：我不为个人情操所动。我关心我的农民，我孩子们的生活。我最担心的是他们。他们是我斗争的源泉。不能让他们受华盛顿培养出来的人的统治。我多么希望世界上能有一块地方，有这三大价值。

中国和越南现在都进入了市场，这是顺应历史的发展。而历史也必然要控制市场。所以，我有信心。

陈：邓小平有这样的思想。毛泽东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

场是资本主义。邓小平认为两者都是手段。看是谁去控制。社会主义通过市场的实践，通过政治改革进入民主。

巴：但愿这样。假如那一天真的来到，我会安安静静地死去。即便已经死了，也会高兴地再活过来。

陈：不管什么主义，都应该让人民享受到自由、公正和正义，还有富裕。社会主义在非洲怎么样？

巴：别提了，我最失望了。40年来，我和我的同时代人不断奋斗，很多人死了。我们尝试了武装斗争。我还蹲了八年的监狱。塞内加尔在2000年2月又进行了民主选举，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我所在的共产党在选举中获胜。他们要把原先的社会党全数扫地出门。我不同意。你把他们都扫地出门了，谁取代他们？现在的政府里有很多我的朋友和战友。人民相信我们，把政权托付给了我们。我们既然上了，就绝不能让人们失望。塞内加尔非常穷，有的地方每天吃不上两顿饭。塞内加尔的情形就是非洲的情形。只是塞内加尔走在非洲的前面。那里的人民仍然抱着希望，相信我们。

陈：你还像两年前在南非夜谈时那样，认为应该通过选举执政吗？

巴：是的。我的老师格瓦拉说过，只要有一线民主的希望，就不能用武器去争取。

陈：你愿意作为总统，带领人民实现你的理想？

巴：如果在几年前，我会说愿意。可是，我现在已经60岁了。应该让年轻人了。不过，现在的塞内加尔总统有74岁。

陈：如果你的朋友们在权力中腐化了，你还会像当年那样拿起武器来反对他们？

巴：我会的。他们掌握政权后发福了，红光满面。他们斗争了几十年，终于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但权力是最危险的。他们都处于危险之中。塞内加尔和古巴的关系发展比较快，和中国的关系，因为台湾问题，不太如意。

陈：如果你上台当总统，建议来中国考察一下，学习反权力腐败的经验。

巴：我一定去。而且作为接受当总统的条件。我的朋友都上台了。而我，不可能放弃我的追求性质。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地球上还有像我们这样的人为这种追求而努力。

陈：你对世界社会公民空间怎么看？

巴：这是非常好的模式。在这一空间，我们有着很多分歧，但有一个基本价值把我们连在一起。每一个时期的人都有着自己的角色。我代表强硬派农民。年轻人起来了，他们有很多目标。我对我的农民兄弟说：如果你想保持农民力量，就一定得开放。要不，就会被淘汰。

小李问：你到过发达国家吗？

巴：我去过美国，两次，去过英国一次，多次去法国。我们公民社会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我到这儿参加论坛，学到很多东西。为我们的斗争提供了智慧，坚定了信心。

陈：你觉得公民社会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很大的推动力，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巴：我坚信。公民社会将比今天的国家和国际机构的作用更大。如果说国际社会以前对此不太清楚的话，今天的情形已经不同。西雅图会议证明了这一点。今天，没有任何一个阶级能独立控制社会。小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都已是明日黄花。

巴哈在监狱里获准函授法律学习。一年学期结束，能短暂离狱去大学参加考试。军人政权结束，文人政权上台之后，巴哈获释。被母校塞内加尔大学聘为法律教授。属国家公务员，月薪两万法郎。是农民收入的几十倍。巴哈实在舍不得他的农民兄弟。没过两年，他辞去塞内加尔教授职位，到农村做农民，搞农民运动。家有15口人。种5公顷地，有玉米、水果。有时一天吃不上两顿饭。他说，这在塞内加尔的农民那里，是很普遍的。

9月7日下午周五论坛结束。我们会议代表被通知在15:15去1号大厅。1号大厅与我们开大会的3号大厅在同一楼层。从论坛开幕至今，几乎天天有人悄悄告诉我，将有卡斯特罗接见。我们也随时准备着。心里七上八下地嘀咕，卡斯特罗会不会也搞出其不意。等到今天下午，从一切迹象看，气候成熟了。所谓迹象，首先，我们每人发了一张一寸大小的纸头，上面有号码。连发我们纸头的会议组织者也不知有何用。够神秘的。“肯定是座位号。”我们几个人判定。其次，会议通知傍晚18:00有古巴方面为我们组织的古巴各界代表出席的庆祝会，古巴人士有1600位。这我们在下午草坪上晒太阳时已经发现：几列队伍不断地从各方往大会堂里涌入。傍晚五点半，大会早早散场，我们代表不得出去，立即去对面的大会堂厅。两个入口，人潮汹涌，我们好不容易挤进右侧大门（着急进去找好座位看卡斯特罗），门卫指指我们手上的票头，又指指走廊中间那堆人。我们只好又挤出门口的人群，又挤进走廊的人群，递出票头，人给我们每人一个白色塑料袋。袋子软软的，不像文件袋。我们在奋勇挤出来，找个能立脚的地方，打开袋子看：里面是一块面包，一罐可口可乐，还有别的什么食物。带这样的袋子进去见卡斯特罗，有点不太雅观，何况我们个个都有减肥的需要或想法，便商量了一下，把口袋分送给正在排队进入会场的劳动代表。我的口袋送到一位中年妇女手上，她接过，点头感谢。

我们在主席台正对面第三排找到五个座位，前面两排不让坐人，空着。越光说这是出于安全考虑。找到位置，我们各自拿出相机，准备按下关键时刻。现在要见到卡斯特罗，可不太容易了，至少远远比见希拉克或克林顿要难。我们正在全神贯注，准备听到入口的掌声，迎接古巴总统，忽然冯至大叫一声：糟糕！没有胶卷了！我们赶紧检查自己手中的相机，简直像是商量好了似的，我们的相机，没有一个还有胶卷的！全部照完了。现在这一时刻，又无法出去，就是出去了，也不容易找到卖胶卷的地方。附近没有商业点，宽阔的大道，只有树和旧时代留下的石头建筑住房，我们昨天去大使馆回来，走了两小时，

没有找到一个有卖吃的的地方，更别说饭馆和胶卷了。这里的商业行为和我们60年代的小县城差不多。怎么办？

六点半，主席台右侧出来一群老人、妇女、小孩，开始跳舞。同时，右侧通道出来一群人，走在前面的就是卡斯特罗。他身材非常高大，步履倒有点艰难了。他和随从走到我们前面的第一排位置，坐下，与我们就相距几个头的距离。我看看周围的四位代表，他们神情似乎比较激动，不过没有泪水，也没有欢呼。中国人是有理念的民族，有理念的民族容易激动，法国人也是这样，所以有他们的革命。

音乐歌舞一段之后，劳动模范、会议代表讲话。巴哈代表我们做大会发言。他情绪激昂，我还从未见他这么激动过。他大概想起了50年代在古巴接受格瓦拉游击训练的往事了。卡斯特罗听着，不时拿出一个方正的白色纸片，在上面记下几笔。最后，他站起，慢步上台，开始演讲。他一开口，精神就完全不是刚才的模样了，情绪极好，滔滔不绝，讲了一个半小时。主题是批判美国，赞扬古巴人民的硬骨头精神。期间，出乎意料，两次特别面向我们，赞扬中国在解决贫困与饥饿上的巨大成就。

卡斯特的记忆极好，讲演中数字不断，尽管有的数字似乎有可讨论的余地，但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他已经谈别的事去了。所以，我们听众始终只能随着他的思路走，他的思路跳跃很快，不容易跟，哪里还有闲暇去考证数字呢？

讲演完毕，他走出主席台，向大厅出口迈步。又恢复到老样子了：步履有点艰难。

就这样，我们和瑞士人类进步基金会，越光和世界，在蓝天之下走着。

“去年的雪到哪里去了？”诗人不怀旧，维庸在与记忆的未来对话。